

王瑞功 主编

诸葛亮研究集成

齐鲁书社

王瑞功 主编

诸葛亮研究集成

齐鲁书社

责任编辑:王立华

封面设计:郭 颀

版式设计:张 薇

诸葛亮研究集成

(上、下册)

主编 王瑞功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9.25印张 10插页 1435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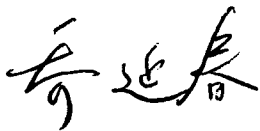
ISBN 7—5333—0547—7

K·135 定价:108.00元



总 序

以临沂市为中心的沂蒙山区，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约在三、四十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古老的文明。这里是东夷人聚居区，他们创造的东夷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以经世性、交融性与向心性为其特点的沂蒙文化，几千年来培育了一代代沂蒙人，涌现出诸如曾子、诸葛亮、王羲之、王献之、颜之推、颜真卿等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与文学艺术家。他们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是沂蒙人的财富，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财富。初步考证，历史上沂蒙人流传下来的著作近三百种，但绝大多数未经整理，难以广为人知、为现实所利用。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临沂市人民政府确定，组织力量对沂蒙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予以抢救整理并研究，编纂《沂蒙名贤丛书》。为此，市政府成立了《沂蒙名贤丛书》编纂委员会，以便加强对此项工作的协调与指导。这部丛书共五十部，将分期分批编纂出版。现在该丛书第一部——《诸葛亮研究集成》已正式面世，借此机会，匆书数语以为序。



1997年3月

序

陈翔华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政治家。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我认为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是：第一，有洞察未来的科学预见，并且能够提出对形势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或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决策或主张；第二，有显著的治绩；第三，有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必具的品格和能力。显然，诸葛亮是具备这些条件的。

诸葛亮在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答刘备问所作的《隆中对》，不仅科学地预见了曹操、孙权与刘备三家势力必将形成鼎足对峙的局面，并且还依据这一预见而提出夺取荆州、益州，联孙拒曹的战略决策，促使自谓“智术浅短，遂用猖獗”的刘备势力迅速壮大，以致后来发展成为抗衡曹、孙的力量。尽管比之于曹、孙二家，刘备势力较弱而且形成独立政治力量的时间也较晚，但是一旦崛起于长江中上游，并跻身于鼎分天下的舞台而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家，这段历史年代才被人们称之为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及他次年使吴说孙权结盟而取得赤壁之战的抗曹胜利，对于整个局势的扭转以至三国历史的形成，其作用乃是至关重要的。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诸葛亮在坚持“外结好孙权”的同时，“内修政理”，治绩卓著，蜀中“风化肃然”而成为三国中政治搞得最有条理的一国。在法治方面，诸葛亮曾主持制订法典《蜀科》并亲自撰作《科令》、《军令》等律令，行法严明，使“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纲纪整肃，“上下有节”，彻底改变了刘璋父子政治败坏的局面。在进人方面，诸葛亮选贤用能而一反任人唯亲，初入蜀时辅佐刘备大胆录用刘璋姻亲旧部、益州人士以及原来反对者，不仅解决长期存在着的东州人与土著士族的矛盾，而且既迅速地稳定了政局，又对争取财政经济情况好转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重视考察下层官吏，果断地把良才破格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如识蒋琬，用杨洪、何祗等人，因而“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在发展经济方面，诸葛亮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务农殖谷”，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休士劝农”，分兵屯田；他还关心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发展盐铁、织锦、建筑以及交通运输事业，因此“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廩实，器械利，蓄积饶”，经济得到发展，国力有所增强。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诸葛亮采取和抚方针，如平定南中“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唐裴度碑语），大量录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改善民族关系；又传播先进文化，开发其经济，大大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他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并根据民族地区特点进行治理的政策是当时最好的政策，他比封建时代其他政治家要高明得多，因而千百年来南中各族人民一直对他表示怀念和爱戴。

诸葛亮曾经自比春秋战国时的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具有为实现远大抱负的高尚品格与杰出才能。他一生操劳国事，对事业怀有极其坚强的政治责任感，《后出师表》虽是别人依托，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语确能成为他忠勤献身精神的生动写照。他十分重视“集众思，广忠益”，鼓励群下“直言”、“勤攻吾之阙”；对于过失，他严于责己，街亭失守，罪在马谡，但引咎责躬，上表请求处分，“自贬三等”，从丞相降为右将军。他宁静淡泊，清廉自奉，除薄有桑田外，“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家中“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的才能也是很杰出的，王夫之赞扬他：“军不治而惟公治之，民不理而惟公理之，政不平而惟公平之，财不足而惟公足之”。甚至连当时的敌国重臣也不得不称许：“诸葛亮明于治国”（刘晔语），诸

葛亮善治国”(贾诩语)。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曾赞扬诸葛亮之政治,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秦汉至晋代,出现了吕不韦、李斯、萧何、陈平、霍光、邓禹、曹操、司马懿、王导等等重要政治家。他们的情形与诸葛亮颇有异同,其中有的人某些功业确也胜过诸葛亮,但就上述基本条件的总体而言,诸葛亮则无疑优越之。“诸葛大名垂宇宙”,1000多年来素为人们所尊敬与赞扬,后来又被搬进了书场与舞台而成为妇孺尽知的人物,对我们的民族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尽管不无带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他的思想、著作及其影响所产生的精神作品已经成为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华,来作为今天的借鉴。尤其是关于诸葛亮在处理敌友我的关系、夺取统治力量薄弱地带以建立根据地、协调集团内部各方的利益、坚持“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的赏善贬恶原则、坚持“亲君子、远小人”的选贤任能的进人原则、求直言攻己阙以集思广益等等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对于今天的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贸易上的斗争与活动,仍然不失具有开启人们智思的作用。而且,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诸葛亮其人其事也日益受到韩国、日本以及其他诸国的重视。

对诸葛亮的研究,近年来有新的进展。80年代,以诸葛亮祠墓胜迹的文物保护单位为主体,相继成立了成都、汉中、襄樊、临沂、南阳等地各研究会,多次进行诸葛亮活动史迹及重要祠庙与文物遗存的实地考察,并发现诸葛亮后裔聚居地及家谱。八九十年代之际,北京、武汉、上海、成都、郑州等地史学界,分别集会讨论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此外,还曾举行过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出版一些颇可观瞻的论著。但是,从整个研究情况来看,在广度的开拓与深度力度的加强等方面还都要下更大更多的功夫,而其首先必须重新掌握大量资料并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诸葛亮家乡所在地区的山东省临沂师范专科学校,1988年为此专门成立诸葛亮研究室,

这是一项值得学术界称道的举措。现由王瑞功先生主编的这部《诸葛亮研究集成》，就是该研究室多年辛勤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诸葛亮研究集成》是一部汇集诸葛亮著作以及有关其人其事之书。所载文字始自三国时期而至于清代，内容包括诸葛亮文集，与记述他的碑传年谱、琐闻杂录、历代评论，及至以他为题材的诗词小说戏曲等文艺创作。此前，明清时期已有类似图书多种，但是失之于所收资料既缺漏不全，编订又甚有舛误，故颇为学者所诟病。而《诸葛亮研究集成》则在前人耕耘基础上，汲取其积极成果，力求避免其弊端以超越之，为当今研究者提供足可参考的丰富资料。

一部古籍图书是否整理得好，特别是资料汇编性质之书，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衡量，即第一，资料搜集是否完备，尤其是代表性的重要资料有否缺漏；第二，编排是否合理而有序；第三，考订是否精审。《诸葛亮研究集成》在这些方面，是很下了功夫的。

这部书取材宏富。编者曾查阅 2600 余种古籍，辑录了大量资料。例如收入诸葛亮年谱达 9 种之多，大凡当今所能见到的，几乎都加搜集。尽管这些年谱内容难免有所重复，编撰水平亦高下不等，但是作为研究资料则都应在罗致之列。书中收入对诸葛亮的评论 180 余家、计 350 余篇，咏怀他的诗词曲赋 500 余家、计 800 篇左右，大大超过杨时伟《诸葛忠武全书》、诸葛羲《汉丞相诸葛忠武侯集》、张鹏翮《忠武志》、虚白道人《忠武祠墓志》等书。其中有些材料还直接采自世人罕见的珍本秘笈。如清乾隆间山东诸城人王紫绪辑《诸葛忠武侯集》乃是极其稀见的手稿本，《诸葛亮研究集成》编者访求之，并采录其中王氏自撰评论 12 篇。诸如此类，资料弥足珍贵。

这部书的编排较为合理。全书依资料的性质，分为上下两编。每编各卷类资料的先后排比，大体上依其产生时间为顺序，借此则可以窥测历史发展的轨迹。例如对于诸葛亮本人的著述，编者将可

以确认者列于正集，伪托或甚有争议者列于外集；正集文字不再采取以类相从的方法而系年排比，便于读者了解诸葛亮的思想发展与生平历程。

这部书的考订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除校定诸葛亮著作外，还审订了诸家所撰年谱并加按语指出其间的谬误，对诗文作者、杂录出处等等也作了大量的核实工作。

《诸葛亮研究集成》是一部编纂功夫下得很深的书，而这部书的主编王瑞功先生就是一位做事认真、治学严谨的学者。我原先与瑞功先生并不相识。数年以前，我主编《文献》杂志时，他曾投来一稿。当时搞传统文化不受重视而不少人纷纷下海经商，他却坚持从事古代文史的研究工作，文章又写得那样翔实淳朴而颇有见地，我认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论文刊出后，他曾来过一信，但我不记得是否回覆。近几年来，他致力于编纂《诸葛亮研究集成》，也许因为我出版过一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并发表了一些有关的论文，于是便频频来函商讨问题。从通信中，我了解到瑞功先生身处图书资料匮乏的山区，但是废寝忘餐，四出搜求，终于收集到如此繁多的资料，有的甚至为我所未见或未闻，其间工作之艰辛，令人难以想见，使我十分感动。他认真比勘，深于思考，还在注中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瑞功先生在编纂工作中，孜孜不倦，虚心求是，态度十分严肃。现在，他主编的这部书已经杀青，行将付梓。我相信这部书的出版，必将有益于广大读者，而且也将有力地推动诸葛亮研究以及三国史研究的深入。这当是自不待言的。

1996年2月14日于京门

前 言

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思想家。对他的功业，尽管见仁见智，但千余年来，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普通百姓，总是推崇他、追怀他，久而不衰，这在历史人物长长的行列中，却是极为罕见的。这种现象，早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而在今天，研究历史，挖掘这一历史人物的丰富内涵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自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项重要的任务。诸葛亮的故乡是东汉琅琊国阳都县，在今临沂市沂南县境；临沂师专是诸葛亮故乡的学校，我们对诸葛亮更有一种浓浓的乡情。为了突出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1988年学校决定组建诸葛亮研究室，而且明确要求，要使之成为国内诸葛亮研究资料中心之一。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但实际困难却很多：首先，我们这里关于诸葛亮的实物资料极少。因为诸葛亮十三四岁即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南下，其后裔未回原籍；关于阳都城的具体位置，明、清时期尚无定论，直到七八十年代才完全确认；而纪念这位先贤的唯一建筑五贤祠（与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同祀）原设于临沂市城区（建于清代），又在文革中被破坏殆尽。其二，起步很晚。直到1984年成都武侯祠谭良嘯先生一行来临沂对诸葛亮故里进行追踪考察时，在王汝涛教授的积极参与组织下，才有了临沂诸葛亮研究会这一群众学术团体，并与成都、襄樊、汉中三家组成联会，算是与研究诸葛亮的几个中心“并网”。其三，有关诸葛亮的文献资料，没有现成的索引可资参考。我们的资料收集工作，就是在这几乎是空白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数年努力，在成都

武侯祠、襄樊隆中管理处、各图书馆及部分中外专家的支持帮助下,我们手抄笔录,复印、复制了一大批资料。虽然较历史悠久、资料丰富的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襄樊隆中管理处与陕西沔县要差得远,但仅从占有文献的广度方面说,已有自己之长了。

我们之所以把其中一批资料编纂成书公诸同好,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其一,也是最主要的理由,从研究诸葛亮的现状来看,亟需一部集成式的文献。自80年代初,诸葛亮研究进入高潮:各地所设之诸葛亮研究会由最初的四家扩展到南阳、兰溪、天水等七八家;全国性的研讨会已开了八届,国际性的也开了两次。从总体上说,参加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宽,内容也越来越深入;但不可否认,研究起点低、范围小、重复多的文章仍占相当的比例。究其原因,除了研究水平、研究方法、组织领导等条件制约外,资料占有面狭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问题。即以重复旧说为例,是因为重复旧说者未见旧说而自以为新说,造成诸葛亮研究“徘徊不前”的局面,这不仅耗时费力,弄得不好,还会把研究者拖进一个可怕的怪圈之中。诸葛亮是中国人民的诸葛亮,不是某一个地域的;诸葛亮的影响早已跨出国门,也可以说是世界级的历史人物。如果我们的研究裹足不前,那就愧对先贤和热爱着、崇敬着他的人民大众。我们把已有的资料整理出版,就是让研究者了解前人的观点及成果,熟悉一下“行情”;同时,也想吸引一部分有一定研究能力、愿意研究诸葛亮而苦于缺乏资料的学者投身其中,扩大研究的队伍。

其二,前人编纂的诸葛亮文集自成体例者,笔者所见已有十几种,但却远不能适应今天研究者的需求。其突出的不足之处是所收内容偏少:有的仅几万字,多则二三十万字。第二个缺点是所收资料多不标明出处,有些则连作者时代也不说明,这给使用者带来诸多不便。第三是观点上的“一边倒”,即一般只收赞颂性的诗文,而

摒弃批评类的；至多是收录批评批评者的文章。第四个不足是编纂者不加详考，所录诸葛亮文，滥入者不少；所录诗文，有的张冠李戴，有的断章取义，造成了混乱，而这些资料，大多没有整理。据我们所知，仅张澍所辑之《诸葛忠武侯文集》1960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名曰《诸葛亮集》。这次整理，使原书质量大为提高，不仅校正了讹误，并交待了材料来源，对字句异同亦一一说明，给使用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张澍本中之误收、错署情况并未完全纠正，且又增添了一些错误。如卷二《兵法》条（“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系宋人苏洵《权书·强弱》中的一段话，张澍交待了是据“《玉海》引苏氏曰”，看来是未详所出，故误收；卷一《答李恢书》，《太平御览》卷七〇八引《诸葛亮集》为“诏答恢曰”，严可均辑《三国文》改作《诏答诸葛亮》，张澍干脆把作者变成诸葛亮；《附录·故事》卷四《制作篇》“亮所至，营垒、井灶、围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及“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两条，言出自东晋人袁宏《汉纪总论》，其实是摘自西晋人袁准《诸葛公论》；这些错误，整理者皆未指正。卷二《军令》之“两头进战，视麾所指……”条，张澍误收，而张澍本所无、校点者所补的五条中，有一条（“军列营，步骑士以下皆著兜鍪”）亦误收。这两条都见于《太平御览》所引《晋令》，显然不是诸葛亮的作品。诸葛亮文收入《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多寡不一；交待出处时所用名称亦不尽相同；有的用书名《诸葛亮集》，有的用篇名如《诸葛亮教》、《诸葛亮转教》、《诸葛亮军令》等，有一些则仅称《军令》。《军令》是不是皆为诸葛亮文，已难确考，但研究者一向是如此认为的；而《晋令》，在《太平御览》所引书目中单独标出，不能与《军令》相混是很清楚的。这些错误不予纠正，便会以讹传讹。所以，对这些资料吸收之，鉴别之，补充之，作一番比较系统地整理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编纂时，我们提出了四个目标：资料上求全，版本上求善，校注上求确，体例上求当。在现有条件下（时间、经费、能力等），我们

认为是局部地达到了。

所收资料较全。一是门类较全,二是同类资料较全。《诸葛亮研究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共分八卷,另加附录。其中元、明散曲,元、明杂剧及中短篇小说,是此前各类辑录中所没有的。杂剧及小说,是封建社会正统文人所不屑道或不乐道的。但是,随着三国故事尤其是诸葛亮形象之深入民间,小说、戏剧中之诸葛亮,已经被人民群众“改造”了,和历史形象的诸葛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不将这部分内容纳入其中,我们所见的诸葛亮形象便仅仅是一种面貌——历史的面貌。然而,表现诸葛亮形象的艺术门类甚多,数量甚大,如雕塑、剪纸、民间故事、弹词、子弟书、传奇及各种地方戏曲,又绝非一部书所能包括。象有些颇具特色之清代传奇《草庐记》、《七胜记》、《南阳乐》等,在初编中就不予收录。而对确定选入的门类,则尽量在内容上求其全。如《传记卷》收十六篇,未收者或属存佚不详,如元人戴羽《武侯通传》、清人汤成烈《季汉书·诸葛亮传》;或属摘录、缩写类,如宋人张豫《百将传》,是以陈寿《诸葛亮传》略作删削而成;其它如《名相传》、《廉吏传》等,则是缩写,仅几百字。《年谱卷》收录九种,未收者大都属见于著录而存佚不详者,如清人杨中江之《诸葛武侯年谱》,仅见于《山东通志》卷一百三十二《著录》;近人梁启超《诸葛忠武年谱初稿》(手稿),《历代年谱综录》有著录,并说明“未见”……。明人诸葛羲所编《汉丞相诸葛忠武侯集》卷一之《年谱》已说明系采杨时伟编纂之谱。经核对,基本上无改动,仅在交待材料下落时随其体例变之:如《出师表》,杨时伟本作“二表俱载《北伐》”,而诸葛羲本作“二表俱载本传”,故未录。《文集卷》分正集与附录,在前人基础上又作了辑录。《评论卷》,辑录近200家360余篇;《记序卷》收100余篇;《诗词曲赋卷》,仅诗歌即录入600余家800余首……这种规模,是此前所未有的。历史上贬低、批评诸葛亮的文字数量不多,我们就其所见,尽量囊括,如北魏崔浩、宋人俞文豹(实为其兄俞文龙之说)、明人王维桢等的文

章。明末清初徐世溥批评诸葛亮的一篇，收在他的遗著《榆溪集》中；但清初编《豫章丛书》时，徐世溥之文就以《榆溪集选》之目出现，作了删削，原文遂不传于世，仅能靠王士禛之批评徐世溥一文而窥其一斑。

版本上求善。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尽量寻求早期版本、善本、全本，并争取收集多种版本用以校勘。元人赵居信《蜀汉本末》，有元至正本、明初成都刻本、清抄本，我们取至正本为底本，用清抄本校勘；明人谢陛之《季汉书》，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所介绍者为五十六卷本，我们查到了六十卷本，即以六十卷本为底本。它如王维桢《王氏存笥稿》、沈津《忠武录》均为明嘉靖刊本；《襄阳府志》找到了明正德本、万历本及清乾隆本、光绪本；朱璘《诸葛丞相集》用万卷堂刻本、张鹏翮《忠武志》为冰雪堂本，都是原版书……。仅明代原刊本，我们就采录了50余种；其它则主要是嘉庆前之清刊本。同时，我们还收录了一部分明代、清代的手抄本及原稿手稿，则更为珍贵。如戴少望之《将鉴论断》系明嘉靖抄本，乾隆年间诸城人王荣绪之《诸葛丞相集》则系手稿。

求确，是原文正确、出处明确、作者清楚、注释准确。我们多方寻觅善本及不同版本，中心目的就是“求确”，不是为善本而“善”。有的善本不一定是全本，要补齐，有时颇费工夫。张枬所著《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阮元《宛委别藏》收录的是景宋本，刻工精美，但是最后几行空缺几十字，简直难以句读；而其它不少版本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对后半部分删而不录。后来我们查到了明人沈津编纂之《忠武录》（唐藩刻本）收有此传，经过对勘，一字不少，终于把景宋本补足。元刊本《蜀汉本末》有四个字残缺，利用清抄本补上了三个。在使用复制资料时我们发现，由于复制技术或其它原因，使用时要非常小心。有的原本不残，复制件则有残缺。为了真正求确，条件允许，有了复制件也要再查原本。当然，光凭这些要使原文正确还不够，因为有些文字也许原件、原刻即错，那就需要其它手段

如直校、互勘等。

出处明确,说来很简单:只要实事求是地注明即可,但做起来有时也挺复杂。比如,元代诗人揭傒斯有一首诗,《滇志》上有,明人王士骥所编《诸葛忠武全书》及清人朱璘《诸葛丞相集》中皆录;虽然诗的题目不同,但诗句一样;然而揭傒斯的诗文集《揭文公集》中却无。类似情况,出现在王守仁等不少名家身上。这里的“出处”问题,实际上是认定作品真伪的问题。在文学史上,作家有自己编的集子,自己进行了筛选;或者作者故去由后人搜集,并不齐全;这些情况并不是罕见的。特别是有些文人墨客或地方官吏参加了祭祀诸葛亮的活动,临时诗兴大发或被人所求而留下诗文,本人并不在意,而当地人却记录并留传下来。所以,考察作者的经历是至关重要的。揭傒斯到过云南,王守仁曾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故他们在当时当地写下歌颂诸葛亮的诗文,是可以认定的;今人如果整理这些人的文集,倒不妨作为佚诗辑入。同样,所谓原始出处也是相对的。有些人本身原无文集传世,地方志或当时编纂者收录了他们的作品,这恐怕就是其全部“文学遗产”了,而这些方志或文集也就是此类诗文的原始出处。

“作者清楚”,对于我们编纂《集成》来说,可能是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了。因为这部书收录的资料,作者近千人,而大部分人物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研究的资料,真正的名人毕竟是少数。尤其是记录这些诗文的某些资料,有些不标朝代,更不说明其字号、籍贯。中国人重姓名者多如牛毛,同时代尚且如此,更何况不明朝代者呢?要使作者明确,就得大量的依靠方志、笔记、诗话一类的“特色”文献。例如朱奂、柯甲,《勉县忠武祠墓志》收录了他们的诗作,我们原先只在《中国古今人名大辞典》、《四库全书总目》、《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和《明清进士题名录》等工具书中寻查,“朱奂”之名倒发现了两个,系明、清时人;柯甲踪迹未见;后来终于在明人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里落实了他们的时代和籍贯(皆宋代三山人)。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同一篇作品在不同的文献里署名不同,有的甚至多达四、五种。遇到这类问题,除了确实无法认定者外,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客观地注曰“某书署某人、某书另署某人”,而是尽量予以考证,使其明确。有时我们被许多材料迷惑走了弯路转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地,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隆中十景诗》其中一组的作者究竟是王越还是王钺?是哪一个王越或王钺?因为这一组诗被收录于若干方志、文集中,而或署王越,或署王钺;既有明王钺,又有清王钺。我们最早见到的是今人刘叔远《隆中艺文录》(油印本)中录有此诗,编者说明是清代诸城人王钺。但又见明人诸葛羲编《诸葛忠武侯集》时已录,可见不会是清人而应是明人。正德年间所修《襄阳府志》录有“十景诗”中两首,署的是“王越”,时间又早于诸葛羲编文集不少,故我们认为应以“王越”为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介绍了明代两个王越:一是浚人字世昌之王越,一为长洲人字孟南之王越。浚人王越进士出身,官居高位,于是确定了他为此诗作者。但查其所著《襄敏集》未收此诗,且其人又两次勾结宦官,时名不佳,我们又转而倾向于长洲人“王秀才越”,但并无确实证据。嘉靖刻本《忠武录》上此诗作者又署王钺,且注其历官为“都御史、太傅”,我们又转而考察王钺。经查,见明朝有三“王钺”,两个进士、一个举人,都未任高官。而浚人王越则任过左都御史、太子太傅,死后赠太傅。这时,我们才基本认定《忠武录》之“王钺”应系“王越”之误。兜了这么一个大圈,最大的教训是不能让资料中的某一点牵着鼻子走,要冷静地、多方面地思考,才能少走弯路。类似的问题我们遇到了很多,其中包括王安石、杨慎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有些容易考辨,有些难度较大,少数则目前尚难认定为谁。

注释时,除了较难的词语、典故外,我们侧重了史料的辨证。也就是说,不论传记还是年谱、评论等等,只要是属于“有误”的地方,我们都在注释中予以纠正:如明佚名撰之《诸葛忠武侯年谱》于“章武二年壬寅”下记曰:“张飞卒,以侯领司隶校尉。”我们在注中指出

应系于章武元年；朱璘将立刘禅为太子时书于章武元年六月，我们注明应为五月；并阐述了理由。对某些有待明确或我们的看法与前贤见解有异者，亦不揣浅陋，在注中予以论述。如189年曹操在己吾起兵，其父曹嵩怕致家祸，故避难琅琊。琅琊国地域甚广，其避难地为何县，史无明文。我们通过《三国志·武宣卞皇后传》及《武帝纪》、《陶谦传》、《后汉书·应邵传》，又参阅了裴松之注，认定其避难地为琅琊国开阳县，即今之山东临沂市城区，因为曹嵩的亲家卞远（曹操岳父）为琅琊开阳人，其时此地局势稳定；193年，曹嵩在奔赴曹操鄄城任所路上，被杀于费、华之间，费、华皆属今费县境，正是由临沂去鄄城必经之路。诸葛亮之《诫子书》，前贤认为是写给诸葛瞻的，我们从诸葛瞻的年龄及文章内容诸方面分析，认为这个“子”应为诸葛乔。这样做，是为了求确，但也许有错误，读者诸君特别是专家学者会不吝赐教的。

我们所说的体例合理，是就编纂结构、前后顺序及编排方法而言的。前已言及，诸葛亮有两种面貌——历史面貌与艺术面貌。在这种认识前提下，我们把全书分作上、下两编：上编含《传记卷》、《年谱卷》、《文集卷》、《评论卷》与《记序卷》，主要展现其历史面貌；下编含《诗词曲赋卷》、《小说杂剧卷》与《遗事遗迹卷》，主要展现其艺术面貌；但这只是一种大致划分。因为诸葛亮自身的特点及历史文化的影响，这两种面貌经常是有所结合的，甚至难分难解。《传记卷》中清人汪葵所写之《诸葛公传》，道家色彩很浓；杜甫的“伯仲之间见伊吕”诗句，则成为众多史家评价诸葛亮的结论之语。但按传统的划分，“传”毕竟属于史学范畴，诗歌则列文学艺术之林。从次序上说，先“传记”、“年谱”而后“文集”，是从知人而论文这个角度考虑的。我们编的不是诸葛亮“文集”而是各种资料的“集成”，“知人”就更为重要。

在同一卷中，我们基本上是按作者存世时间先后排列（《文集卷》按写作时间先后、《遗事遗迹卷》或按内容、或按空间，有所变